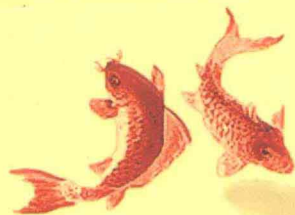


高阳◎著

小凤仙

上



高阳◎著

小凤仙
上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凤仙:全2册/高阳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3

(高阳历史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5026-7

I. ①小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90528 号

©风云时代出版公司

* 本书由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授权,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特约策划:王铁华
责任编辑:夏
封面设计:高静芳



小凤仙

高阳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发经售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35.5 字数 500,000

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026-7/I·3949 定价:54.00元

目录

上册		
1	蛤蟆祭天	1
2	梁启超单刀赴会	12
3	北洋三杰龙虎狗	26
4	二十一条交涉	41
5	九五龙飞	59
6	风雨高楼	74
7	旁观者清	95
8	筹安会登场	120
9	财神梁士诒	145
10	由来侠女出风尘	162
11	“王妃”小桃红	191
12	当头棒喝	204
13	小凤仙结婚	221
14	醇酒妇人蔡松坡	234
15	雪夜看禁书	263



1 蛤蟆祭天

青岛成了民国的首阳山。

自从“新约法”公布，国务院改为政事堂，袁世凯特派长子克定来劝徐世昌的驾，到北京出任国务卿以后，遗老的阵容自不免减色；但“十老”之中，还有两名“总督”，一个“状元”，诗酒唱和，饱饫鱼翅燕窝之余，大发“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河山之异”的感叹吟咏，依然是小报上的好材料。

这一天是在“周玉帅”家集会——周馥，字玉山，做过两广总督；他自己是袁世凯的亲家，他的儿子周学熙又是袁世凯的财政部长。这位齿德俱尊，顶有福气的遗老，家厨出名，招待周到，所以每逢他作东，一定十老毕集，而这天却少了一个。

“噢！赵次帅呢？他的兴致最好，赴会必早，何以今天不见人面？”

问这话的是原籍山东，寄居浙江，做到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，他口中的“赵次帅”是指赵次珊，也就是当过东三省总督的汉军旗人赵尔巽。

“你还不知道？”周馥答道，“赵次珊进京去了。应项城的征聘，就了清史馆馆长。名山事业不急在一时，接了事，马上就会回来的。”

果然，十天以后赵尔巽由北京回到青岛，劳乃宣特地去拜访他，想打



听打听“春明近事”。

“项城倒还是故人情重。”赵尔巽说，“虽谈不上日理万机，也够忙的。承他两次邀饮，谈得很多，总算有几句肺腑之言。”

“喔，”劳乃宣急急问道，“他对‘皇上’是何态度？”

“项城自道：如今一切的作为都在调护皇室，本没有辜负先朝之意。他跟他的老把兄谈过，想卸去仔肩，无奈找不到替手。”

劳乃宣知道，赵尔巽所说的袁世凯的“老把兄”，是指“小朝廷”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；这“找不到替手”的话，是不是世续所说，倒要问个清楚。

“是的。”赵尔巽答道，“世伯轩认为当今尚无一位能够笼罩全局，调护幼主的人，项城只好冒天下的大不韪了。”

“看来项城倒是用心良苦！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。”赵尔巽点点头。

“次帅！”劳乃宣很兴奋地说，“我一直有个想法，如今倒像是可行了。”

“请教！”赵尔巽又问，“是不是你那《共和正解》的卓见？”

“时势略有不同，我预备再写一篇《续共和正解》，等脱稿后，请次帅指教。”

劳乃宣连夜动笔，提出了他的复辟主张。袁世凯虽有归政之心，但小朝廷的宣统皇帝方在冲龄，大政不能亲裁；如果另外找一位摄政，又难得适当的人选，算来算去，还是袁世凯最适当。

照劳乃宣的想法，宣统亲政总得过了十八岁，那时袁世凯不死也衰迈了，所以预定“十年还政”，这十年中，袁世凯以民国的总统为清朝的摄政。他想出来很得意的一句警句：“以欧美总统之名，行周、召共和之事。”将袁世凯比作周公、召公，不但颂扬得体，而且“共和”两字有了着落，所以叫做“正解”。

为袁世凯着想，这十年之间，名位实权一无所损。而在十年以后，还政之时，清朝应该封以王爵——当民国的总统，退位以后是老百姓；还政清朝，则当过总统，还可封王，不但护卫森严，得以保护他的安全，而且“世袭罔替”，他为袁家的子子孙孙都打算到了。

写成了这篇《续共和正解》，劳乃宣异常得意，一面托赵尔巽带到北京；一面写信给周馥跟徐世昌，请他们在袁世凯面前，代为进言敦劝，采纳他的建议。

赵、周、徐都不负所托，他的稿子他的信，一起都送到了袁世凯办事所在的西苑春藕斋。

“劳玉初的心地倒还明白。记得庚子那年他当直隶吴桥县令，严办拳匪，地方未受骚扰，总算还有见识。”袁世凯指着《续共和正解》问徐世昌：“菊人，你看他的意见如何？”

徐世昌慢条斯理地答道：“用心可嘉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袁世凯说道，“叫他来做参政吧！”

参政的正式“官名”叫做参政员——根据袁世凯一手制造的新约法，立法机构采取一院制，定名就叫立法院；在未成立以前，先设参政院，代行立法职权。特任软禁在瀛台的黎元洪为院长，参政员七十三人，由总统直接任命，除了被袁世凯指为“乱党”的国民党员以外，新旧名流多被罗致在内。只看赵尔巽和另一个“总督”李经义亦不过参政的名义，就可以想见此“官”不小。

民国而主张复辟，不但不会办罪，还做了高官；可见得袁世凯大总统心存清室，于是遗老遗少大为起劲，认为“日月重光”之期不远了。

复辟的说法看来是荒谬的。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志士，前仆后继，十次起义，不知丢了多少脑袋，才开创了一个从古未有的民国；袁世凯捡便宜



搞了个总统当,岂有得福不知,再推戴宣统去当皇帝的道理?一个人犯贱也不能贱到这样的地步。

话是不错,但有些迹象又如何解释,只说从夏天以来的变化好了。第一是改设政事堂,内阁总理变了国务卿。照袁世凯说法是仿照美国的名称,可是美国的国务卿是外交部长,日本译名称为国务卿,有些牛头不对马嘴,特为采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官名,无非是取那个“卿”字;皇帝对臣子客气,不是称“卿”吗?

这一点用新官制来印证,更觉显然,文官分三等九级“卿、大夫、士”三等,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级,像“上大夫”这种官称,封建意味太足了!

武官改称“将军”,这也是沿前清八旗驻防制度而来的官名;任命段祺瑞为“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”,更是明朝都督府的遗制。此外还有祀孔、“郊天”之议。孔子万世师表,不废祀典,犹有可说;南郊祀天,则是皇帝独有的祀典。“受命于天”,称为“天子”,总统是受全国人民的付托,与天何干,祀天何为?

这些历历有据的事实,除却是为复辟做准备以外,再也不能有适当解释,因此小朝廷中上至毓庆宫的“师傅”,下至“打扫处的太监”,莫不欣然色喜,奔走相告。落魄的“旗下大爷”,日夜憧憬着按月“关钱粮”的好日子,更是兴高采烈,加意渲染,于是有人给这一年——民国三年甲寅,叫做“复辟年”。

风声越传越盛,有个相当于前清御史的肃政史夏寿康,特参一本,案由叫做“检举复辟谬说”。层层转到春藕斋,袁世凯提笔批了一句:“交内政部查明办理。”

查禁“谬说”的告示一出,小朝廷首先着了慌,怕因此会被取消“优待条件”,上上下下噤若寒蝉。已经到了济南的劳乃宣,也不敢北上来就参

政，转回青岛。这一下，京城里“复辟”的流言，才渐渐平息下来。

* * *

不久，冷镬里爆出一颗热栗子，有人到步军统领那里去检举，说是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公然演说“还政清室”，请求查办。这个人是宋育仁的同乡，借钱没有借到，心中怀恨来告状；但却不是诬告。

宋育仁是四川人，也算是王湘绮的得意弟子——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礼聘王湘绮主讲尊经书院；宋育仁跟他的师生关系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
也就由于这一层师生关系，王湘绮当了国史馆馆长，宋育仁得老师的提拔，充任国史馆的协修，修史在清朝，是非翰林不能承当的职司；但国史馆协修，那里有翰林院编修的称呼来得清华高贵？因此，劳乃宣的《续共和正解》一流传，宋育仁大为兴奋，公然演说“还政清室”便可国泰民安。当然，到那时候他就是翰林了。

* * *

宋育仁一出门便发觉有异，看这两名士兵的制服，是属于步军统领衙门的。这个衙门负责京师的治安，光顾上门，决非好事。宋育仁不由得便想到了“严禁复辟谬说”的告示，两条腿瑟瑟地抖了起来。

“你是宋大人吗？”

问话的态度相当恭敬，宋育仁颇觉意外。“是的。”他强持镇静，“我就是宋育仁。”

“宋大人！”那士兵“叭哒”一声，皮鞋跟碰摆，行了个军礼，“我们统领大人有请。”



这看来没有什么恶意，宋育仁就“抖”起来了，“我在广和居有个饭局。”他昂然答道，“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统领好了。”

“我们统领也备了饭在那里。说是务必请宋大人屈驾。”士兵将手一指，“统领特地派了他自用的马车，叫我来接宋大人。”

这变成情不可却了。广和居那个“文酒之会”可到可不到，宋育仁便点点头答应，坐上马车，直驰步军统领衙门。

步军统领名叫江朝宗，字宇澄，安徽旌德人。他本来是当店里的学徒，不堪朝奉的虐待，一逃逃到天津，正好袁世凯在小站练兵；江朝宗为了求个啖饭之地，投身行伍。当店的学徒要认当票，自然就认得字，所以为袁世凯所识拔。他的相貌长得很体面，个子虽不高，魁梧结实，是一副憨厚之相，而又最恭顺不过，颇得袁世凯的欢心，不次拔擢，竟当到步军统领。这个职位是“荣中堂”荣禄当过的，俗称“九门提督”，在老百姓面前威风非凡；不过江朝宗倒颇有自知之明，自己的才能决不能跟“荣中堂”相比，因而也不敢作威作福，特别是对大小官员，一团和气，十分可人。

“宋先生，久仰、久仰！”

宋育仁跟江朝宗还是第一趟见面。看他穿一件闪光烁亮的酱色团花缎袍，黑缎珊瑚套扣的马褂，下身却着一条黄呢军裤，蹬一双长可及膝的红皮马靴。这副中西合璧、文武兼备的装束，配上他那傻乎乎的笑容，让宋育仁差点笑了出来。

“不敢当！”宋育仁绷紧了脸还礼，“江统领见召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“小事、小事！”江朝宗收敛笑容，皱一皱眉，“有人对宋先生不礼貌，说宋先生也赞成复辟？”

“不是！”宋育仁这样分辩，“我是见了劳玉初的文章，想驳他——。”

江朝宗连连摇手，打断了他的话，“宋先生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他

用安慰的语气说，“请宋先生写一篇答辩的文章，让我能够交差就行了。”

接着便替他预备笔墨茶水，留他一个人在屋子里静静构思。宋育仁定一定神寻思，如以为做篇文章便可过关，是件很便宜的事，那就错了！这篇文章可能会呈给袁大总统看，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决不可轻易放过。

主意一打定，下笔就容易了，开头申明宗旨，说“劳乃宣著续共和正解，可采而有未洽”，未洽者何？就是他要补充的，“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，定名大总统独称公。”劳乃宣建议“还政”以后，袁世凯应该封王，而他主张称“公”，近于贬下；这一点他也有解释，照现行的官制，卿、大夫、士三等而论，上面应有一位“公”才构成完整的系统。接下来，论调便由复辟而隐隐然变为劝进了。

交了卷，由江朝宗的秘书奚以庄陪着吃了饭，仍旧用马车将宋育仁送回家。江朝宗并无下文交代，情形看起来似乎又不大妙了。

过了几天，得到确实消息，内政部根据步军统领衙门所送的那篇文章，呈文大总统，说：“宋育仁议论荒谬，精神紊乱，应遣回原籍。”然后，步军统领衙门又派人来请，不用说是要执行命令了！所谓“遣回原籍”，当然是当犯人“递解回籍”。

到了步军统领衙门才知不然。江朝宗设盛宴款待，酒过三巡，主人道明本意：“大总统的意思，想请宋先生暂时回川休养。至于路费一层，宋先生不必担心。”说着递过一个红封套来，打开来一看，是一张交通银行三千元的支票。

宋育仁觉得这张支票，好比一张预约的保证书，袁世凯不做皇帝便罢，做了皇帝，自己必有“大用”之日，因而欣然收下，摒当动身。

动身那天，江朝宗特派他的秘书奚以庄护送到车站，明为送行，实为监视。京汉路的火车一开，便算了却这一公案。只是外界不明真相，以为



宋育仁真的是因为鼓吹复辟谬说被递解回籍，一个个吓得噤若寒蝉。当然，骗不过去的，也大有人在，其中之一就是宋育仁的老师王湘绮。

* * *

在袁世凯的心目中，负士林重望的只有三个人：严几道、章太炎、王湘绮。章太炎被骗到北京，不肯向袁，已遭软禁。王湘绮则出于他的得意弟子，又为至亲的杨度的举荐，袁世凯写了自称“世侄”的亲笔信，礼聘到京，充任国史馆馆长；袁世凯本来对他抱着极高的期望，谁知他一到京就让袁世凯啼笑皆非，不能不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

此老不为礼俗世法所拘，悼亡以后，一直以仆妇为妻妾；最后一个周妈，既老且丑，而情好弥笃。受聘入京，携带周妈同行；路过武汉，督军段芝军设宴欢迎，他居然带着周妈赴席。到京那天，袁世凯在居仁堂欢宴，依然少不了周妈陪伴。车进新华门，他忽然问周妈：“我眼睛花了，认不清这座门上三个什么字，好像是‘新莽门’？”

这是有意误华作莽，当时有陪从打了“小报告”，袁世凯颇觉刺心——王湘绮将他逼迫清廷，比作王莽的篡位。

到了居仁堂坐定寒暄，王湘绮手指袁世凯，回头向周妈说道：“喏，喏，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袁四少爷，现在做大总统了！”

这番老气横秋的样子，近乎狎侮。袁世凯无可奈何，心里却是凉透了，知道要想叫此人歌功颂德是不可能的事。

由于袁世凯的冷淡，王湘绮这个国史馆长干得就不是滋味了。馆里的经费每月八千元都由周妈经手，两个月未发，周妈便在枕边诉苦。王湘绮亲笔写了一通公文咨财政部，说要经费像讨债，“殊伤雅道”。他亦不愿屡屡索讨，“相应咨请贵部查照，既不能逐月照发，请即转呈大总统，将国

史馆取消可也。”

财政部接到这样一通既似负气，又似儿戏的公文，当然不便跟他计较，更不能真的贸然呈请取消国史馆，只有先发一个月经费，以为敷衍。

王湘绮平生志业，本在跳出儒家正统以外的“帝王之学”，当袁世凯接纳杨度的献议，卑词厚币敦聘出山时，此老一则动了游兴，再则也要看看袁世凯究竟能不能成气候。在京半年，所见所闻，无不是袁世凯在玩弄权术，不免大失所望。

将袁世凯比做王莽，是就辛亥年而言。眼前的袁世凯，照王湘绮的看法，应该是曹操，因而他在日记函札中，以“陈思”作为袁寒云的代名——以袁二拟之为陈思王曹植，自然是以袁世凯比做曹操。论才论势，袁不及曹，而曹操终其身不敢称帝，袁却已有猴急的模样。就这一点看，便非人君之度。

复辟的流言一兴，在对付宋育仁这件事上，王湘绮看透了袁世凯的本心：表面一套，暗底下又是一套，公然示天下以伪，这哪里是创业之主的作为？袁世凯一定要称帝，而称帝必败。自己一生不做清望官，也说过“虽上西山，不必采薇”的戏言，讽刺过李经义、赵尔巽这班“贰臣”，结果淌在“袁皇帝”这遭混水里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所以此老等宋育仁一走，也动了归志。

走要走得潇洒，才能使人有这个感觉：王湘绮如天马行空，不可羁勒；这一次来就国史馆长，无非游戏人间，乘兴而来，兴尽而归，如此而已。

于是，灵机一动，他又在周妈身上找到了题目。周妈是国史馆的“主妇”，八千元一月的经费，由她一手支配，她用节俭下的经费在东安市场大办首饰衣服，此外还有许多“作威作福”的“劣迹”，因此，报上天天登她的新闻。王湘绮看了非但不气反觉得有趣，自以为是千古官场的创举。



他找的这个题目,也是千古的创举,用“慰亭老侄总统”这个称呼,上书自劾——略有当年“翰林四谏”之一的宝廷,由福建学政任满回京复命,纳红山船妓为妾,自劾无状的意思,而更为诡谲的是,自道不能约束周妈是“帷薄不修”,应该解职。

信送了出去,不等有何下文,王湘绮就携着周妈,飘然出京。临走的时候还跟馆员半真半假地说:“你们可以议朝仪了!”

* * *

朝仪早已有人在议,而且也见诸行动了。

冬至之前数天,由新华门到天坛的大路上,广征民夫、铺黄沙、洒清水,仿佛整治“辟道”,是为了“蛤蟆祭天”。

“蛤蟆祭天”这句谣传,不知意何所指,但流行已久,直到袁世凯在冬至前三天发表明令,方始明白。命令中首先驳斥民国不该祭天之说:“鼎革以来,群言聚讼,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,祭祀非民国所宜存,告朔餼羊,并亡其体,是泥天下为公之旨,而忘上帝临汝之诚。”然后以“天视民视、天听民听、民之所欲,天必从之”这四句振振之词,将“天”与“民”绾合在一起,作为民国亦必须祭天的理由。说是“冬季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,本大总统届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,亲自行礼”,各地方则由行政官代表地方人民致祭。

原来“蛤蟆”是指袁世凯。他本来的外号是章太炎所题,出于他为了挖苦黎元洪进京,被幽居瀛台而改的一首杜诗:“云移鹭尾开军帽,日绕猴头识圣颜”,叫做“猴头”。袁猿同音,由猿而转为猴,又有沐猴而冠的意思在内,所以这个猴头的外号流传颇广。但市井小民却不能欣赏这两个字之中转弯抹角的趣味,看袁世凯矮胖身材,说他像虾蟆倒也不错,于是这

第二个外号，很快也叫开了。

典礼期前斋戒，依照清朝的遗制，由内务部制发“斋戒牌”，自大总统到陪祭官，无不佩戴。同时又特制“九章祀服”，大总统头戴九梁冠样的“爵弁”，身穿十二团的蓝色大礼服，下面着的是印有千水文的紫缎裙；看上面像个茅山道士，看下面像是穿了蟒袍在唱戏。但是，这副不伦不类的模样，老百姓是看不到的；因为步军统领江朝宗、警察总监吴炳湘，还有高高在上，权力足以指挥京城一切警卫兵力的军警执法处长雷震春，已奉到密令，务必做足了“出警入蹕”的派头，好让袁世凯尝一尝“天子躬行南郊大典”的味道，所以从拆除乾隆回妃所住的宝月楼而开的新华门起，往南出正阳门，转往永定门之东的天坛，五步一哨，十步一岗，甚至有些人家的屋顶上，也站着端了枪的卫兵，不准百姓窥看。至于天坛周围更不用说，总有两三千狞眉怒目的士兵布岗，把个本该雍容肃穆的典礼搞得杀气腾腾，仿佛随时会出现流血五步的剧变似地。

冬至这天是十一月初七，节气交在子时，但祀典仍在黎明举行。清晨三点钟，大总统坐装甲汽车出府，由正阳门到天坛；换乘朱轮金漆的双套马车，到了昭亨门外，改坐椅轿进坛行礼——“祝片”上具衔是“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”，他默祷时是不是自称“子臣”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

2 梁启超单刀赴会

接到袁克定的请帖，梁启超颇为踌躇。这年二月“人才内阁”垮台，他辞掉司法总长的时候，心还很热，认为袁世凯还是可与共事的人，所以接受了币制局总裁的任命，想在整顿财政上有所作为。而这番热心很快的灰冷，因为他从六月间开始，一连拟了七个整理币制的计划，有的已经批准，有的还搁置着，而不论已未批准，都成了纸上谈兵。财政掌握在交通系手里，一切调度，都以方便袁世凯为原则。且不说浑水摸鱼，无法整理，就算想整理，也轮不到梁启超来插手。

由此，他算是觉悟了，一介书生，文章报国才是本分。所以坚决求去，借住在西郊的清华学校，埋头著作，一个多月的功夫，写成了一部《欧洲战役史论》。同时跟中华书局谈成了一项合约：中华书局发行一本《大中华杂志》，聘请他担任主任撰述。一行作吏，万种酸辛，还是笔墨中讨生涯，方是安身立命之道。

如今袁克定特下请帖，注明只请他一个，并无别客，那就显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；而且也可想而知，决不是谈学问，而是谈政治。好不容易才能摆脱宦海，如何又轻易卷入漩涡，这就是他踌躇的原因。

经过一番深切的考虑，他终于决定了，还是赴约。他在想，自己的志向，袁家父子或许不了解；不过自己的见解，至少袁世凯是尊重的，也许是对当前的国事有所咨询。听不听由他，自己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，也是书生本分报国应有之义。

邀约的是午宴。梁启超由清华园进城，直到北海——“三海”为总统府的范围，袁世凯的几个已娶亲的儿子，都在北海被赐了离宫；但袁克定是例外，北海的亭台池馆，他可以随意使用，这天是在漪澜堂的碧照楼设宴款客。

宾主礼罢，屏风后面闪出一个人来，梁启超不由得一愣，说是并无别客，怎么还是有客，而且是他所深具戒心的杨度！

“卓如！”袁克定特地解释，“哲子见访。我想，你们是东京旧识，所以我特地留他在这里陪客。天很冷，喝杯热酒吧。”

于是梁启超上坐，杨度打横作陪，袁克定坐了主位；一面闲谈，一面喝酒，主人和陪客都是从容闲逸的神态。

席间谈笑风生，在表面看来颇为热闹，其实是貌合神离。梁启超有意避免涉及政治，而杨度则偏偏将话题往这方面引，很自然地提到了东京的旧事。

杨梁不但是东京的旧识，而且有过极密切的关系，这是袁克定所深知的，只故意装糊涂。因此听杨度一提起，便插一句嘴：“有件事，我久已想请问了，当年两位曾有组党之议，有这话吗？”

怎么没有这话？不过袁克定问得有些不合时宜，因为梁杨这段交往不欢而散——光绪三十一年八月，清廷派五大臣考察宪政，在北京车站遇刺，因此延至十一月方始成行。五大臣中最热心宪政的是端方，通过熊希龄的关系，约请在日本的杨度和梁启超捉刀，起草宪政考察报告。端方所